

朝鲜君臣的文天祥记忆（1401—1887）

□ 赵士第 徐 添

摘 要：作为宋末抗元的英雄人物，文天祥在历时 400 余年的朝鲜王朝得到朝鲜君臣的推崇。朝鲜君臣不仅在经筵中屡屡引用文天祥之言行与事迹，更刊行文天祥的文集、对其加以祭祀。在对文天祥的反复言说与不断追寻中，文天祥不屈抗元的事迹成为朝鲜君臣的一种文化记忆，其背后所反映的是朝鲜王朝政治文化的变革。朝鲜前期的王权更迭与历代士祸，使文天祥成为彰显程朱伦理的楷模，而明亡以后，朝鲜王权的合法性危机又促使文天祥抗元形象得到尊崇，以适应塑造“小中华”的需要。随着清朝同朝鲜关系的缓和以及北学的兴起，文天祥的事迹逐渐被儒林淡忘。朝鲜王朝 400 余年的政治文化与国际关系的变化主导了朝鲜文天祥记忆的塑造，这种文化记忆唯有在长时段的考察中才可获得认知。

关键词：文天祥 华夷之辨 朝鲜王朝

中图分类号：K24; K312.34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22.01.016

文天祥抗元保宋，成为抗击胡虏、保存中华正统血脉的英雄，是中华政治文化延续的象征。朝鲜对文天祥推崇备至，不仅在经筵中讲述其思想或事迹，且众多赴京使臣亲自前往北京文天祥祠祭拜、留下诗文，以表敬意。在一代又一代士人的回忆中，对文天祥强烈的个人敬仰及其抗元事迹的追述形成一种集体记忆，并随着记忆时间、记忆场所的变化呈现出不同意涵。

朝鲜王朝君臣对文天祥的尊崇，不仅是对儒家忠义思想的继承，更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不仅同朝鲜王朝的国内政治有关，且触及明清与朝鲜的关系以及朝鲜士人社会的文化心态。在 17 世纪明亡清立的背景下，朝鲜的“慕华”情结与“奉清”的屈辱现实背离，朝鲜士人开始从对文天祥祠的拜谒中寻找反清复明历史依据和自诩“小中华”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关于文天祥的集体记忆如何被制造、重塑乃至逐渐消除，笔者现依据《朝鲜王朝实录》《燕行录全集》等材料，通过对朝鲜君臣仰慕纪念文天祥的个案研究，寻找朝

君臣对文天祥这一历史人物记忆以及记忆内容变化的内在原因，以窥朝鲜君臣的文化心态与 17 世纪以降朝鲜的“小中华”意识。

一、文天祥记忆与朝鲜王朝初期政治

关于文天祥的事迹、思想等何时传入朝鲜，已难于考证。朝鲜太宗元年（永乐元年，1401）《朝鲜王朝实录》中就记载了“文天祥死于宋，而元世祖亦追赠之”^①这一信息，这也是目前朝鲜对文天祥最早的记录。其实，元代正史、典制并无元世祖追封一事的记载，其来源是明初赵弼的《效颦集·续宋丞相文文山传》中元世祖赠文天祥“特进加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庐陵郡公，谥忠武”^②。这段材料应该是明初士大夫的一厢情愿及对文氏之追思，^③而朝鲜史书引用此种观点，暗示文天祥事迹至少在明初已经传入朝鲜。刁书仁认为：“随着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传播，自然产生一种文化上的寻根情结。朝鲜王朝向明朝购求中国书籍数量、种类

① 《朝鲜太宗实录》卷 1，太宗元年正月甲戌，第 7 页下。

② （明）赵弼：《效颦集》卷上《续宋丞相文文山传》，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 4 页。

③ 据施志艳考证，赵弼的生卒年为 1364—1450 年，因此可以推断元世祖追封文天祥之说在明初已有一定影响，且考证出此事不可信。参见氏著：《赵弼及〈效颦集〉研究》，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5 页。

超过前代。”^①由此可推断，朝鲜通过购书而获得了对文天祥其人其事的认知。

高丽末年，大将李成桂篡夺高丽政权，自立为王，并接受明太祖之意改国号为“朝鲜”。李成桂建国后一直有着“慕华”思想，不仅模仿明朝的政治和文化体制，车同轨、书同文，且深受程朱理学影响，以儒治国，士大夫阶层也以崇儒为尊。^②文天祥作为儒家倡导的忠节之士，自然也成为尊崇的对象。除此之外，朝鲜国家初立，百废待兴，尚有反对势力的存在，借文天祥之事迹，确立忠贞形象，以儆效尤，这不仅体现着朝鲜建国初对中华的认同，还作为李氏朝鲜政权正统性的依据，其代表事件就是追赠郑梦周封号一事。

郑梦周，字达可，高丽著名儒学家。辛禡元年（1374），高丽恭愍王遇害，权臣李仁任立辛禡为王，重新投靠北元。郑梦周与文臣数十人力阻不可，被流放彦阳。辛禡九年（1383），明朝军队进逼朝鲜，郑梦周代表高丽出使明朝，成功缓和两国关系。1392年高丽恭让王因感李成桂势力强大，与郑梦周密谋诛杀李成桂，李成桂五子李芳远（后来的朝鲜太宗）曾遣人游说，不成，最终派人暗杀郑梦周于善竹桥，枭首于市，年五十六。^③

太宗元年（1401），有大臣上书朝鲜太宗，借用元朝追封文天祥的事例，劝太宗追赠高丽忠臣郑梦周名号：

窃见前朝侍中郑梦周，……然犹专心所事，不贰其操，以至殒命，是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也。韩通死于周，而宋太祖追赠之，文天祥死于宋，而元世祖亦追赠之。梦周死于高丽，独不可追赠于今日乎？^④

高丽旧臣郑梦周坚守忠孝节义，不事二主，并写下《丹心歌》以明志，拒绝了朝鲜太宗命其

改变立场、效命新朝的邀请，因此被害。在时人看来，此“专心所事，不贰其操”的举动堪比文天祥宁死不降元，是宣扬忠义气节的绝佳典范。不仅如此，高丽附属元朝，文天祥却是抗元英雄，郑梦周虽仕于高丽，但却宣扬理学，对“中华”抱有极大的好感。因此推崇文天祥、追封郑梦周不但可以宣扬理学家的气节、划清忠义和叛贰的界限，安抚守旧势力，同样也有利于李成桂定下的“事大”政策，从意识形态上巩固自身的合法地位。

高丽与朝鲜的交替仅是一种王权的更迭，朝鲜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均继承了高丽的传统并逐渐加以改革，至成宗朝，社会转型方才完成。^⑤此时以理学为首的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朝鲜文化的基本特征，忠义气节成为了社会普遍认同的最重要的道德品质。因此，成宗七年（成化十二年，1476），朝鲜成宗针对此追赠一事有过一番评论，他将郑梦周与文天祥媲美，称赞郑梦周忠义有节：

节义国家之大防也，古之人臣如文天祥者，世不多有。前朝之季，郑梦周为太祖简拔，位至政丞，其时人有言曰：“若一改心，开国元勋，谁出其右？”梦周终守臣节，死不失义。^⑥

“终守臣节，死不失义”既是对郑梦周的盖棺定论，同样也是当时朝鲜士大夫对文天祥形象的基本认知。这种形象是在国家未稳面临危机之时，告诫群臣行忠义之举的产物，随着朝鲜新政权统治的稳定，文天祥作为这一方面的典型，备受推崇。庙堂之上主要是吸收其治国的思想，行德政。朝鲜君臣通过宣讲文天祥事迹、刊刻《文天祥文集》向臣民推广坚贞节义、忠君爱国的精神，以巩固统治。

成宗二十四年（成化十二年，1493），在侍读

① 刁书仁：《朝鲜王朝对中国书籍的购求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古代文明》2009年第2期，第84页。

② 孙卫国：《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核心理念及其历史演变》，《韩国研究论丛》第2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8—150页。

③ 《高丽史》卷117《列传第三十·郑梦周》。

④ 《朝鲜太宗实录》卷1，太宗元年正月甲戌，第7页上—7页下。

⑤ 参见李丙焘：《韩国史大观》，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第273页。

⑥ 《朝鲜成宗实录》卷70，成宗七年八月癸未，第10页下—11页上。

官俞好仁的建议下，计划刊印《文天祥集》。^①在宣祖十八年（万历十三年，1585）七月：“命刊布文天祥、方孝孺、郑梦周文集。上欲崇表节义，以励风俗，故有是命。”^②在国君的支持下，终将《文天祥集》刊印，并颁行天下，推动文天祥文章、思想的传播和推广，这是朝鲜君主崇尚节义，改变世风的一种手段。文天祥形象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出使中华的朝天及燕行使也会特意去拜谒文天祥祠。在这特定的场所，关于文天祥的记忆得以重新塑造，获得了新的生命。

二、文天祥与16世纪朝鲜的政治文化

成宗以儒家治国，但在他死后新兴的士林势力与勋旧势力却势同水火。成宗之子燕山君即位后，利用《成宗实录》中的《吊义帝文》诛杀金驪孙、表沿沫、郑汝昌等士大夫，将言官系统的士林派儒生屠戮殆尽，史称“戊午士祸”。燕山君十年（弘治十七年，1504），他又利用“尹妃被废事件”，发动“甲午士祸”，打压勋旧势力。两次士祸令士林饱受摧残。燕山君“大肆虐政，诛杀大臣、台谏、侍从殆尽。至有炮烙、斫胸、寸斩、碎骨飘风之刑”。^③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文天祥记忆被重新塑造，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这一时期朝鲜君主对文天祥的关注多体现在其治国思想上。如燕山君三年（弘治十年，1497）台谏合司上疏，借用文天祥治国思想，劝谏燕山君应推行德政，慎刑少武，重视教化，恢复经筵：

昔宋忠臣文天祥劝其主行道曰：“道犹百里之途也，今日则适六七十里之候也。”进于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废；游于途者，不可以中道而画，孜孜矻矻，而不自己焉，则六七十里者，固所以为至百里之阶也。不然，自止于六七十里之间，则百里虽近，焉能以一武至哉？殿下新临大宝，亿万苍生之望，在此初服，此正始步一武之时也。^④

与此同时，明代朝鲜使臣拜谒文天祥祠留下部分诗文也恰好说明了朝鲜借文天祥崇尚节义的目的，如弘治十一年（1498），曹伟作《谒文丞相庙》五首，限于篇幅列三首部分代表诗句如下：

其一

去国肯摇苏武节，存留不愧孔明心。
百年忠义留天地，烈日秋霜照古今。

其三

当日衣冠那复见，旧宫未添亦堪哀。
指南有录无人识，留取声明万古雷。

其五

怀乡堪笑庾开府，识字那论杨子云。
正气不随黄土尽，至今昭晰揭人文。^⑤

可见，作者表达了对文天祥的怀念以及对前朝往事的追思，高度赞扬了文天祥经天纬地的治国能力和被俘后坚贞不屈的忠义精神，同时也启迪后世要效仿古人。这些使臣能有这样的认知及拜谒时流露出的情绪，与朝鲜士林推崇文天祥，行德政、尚节义有极大的关联。

燕山君十二年（正德元年，1506），为了清算两次士祸后残存的儒生势力，燕山君发动第三次士祸——“丙寅士祸”。然而此次士祸却未能成功，原来遭受清洗的官僚联手发动政变，推翻燕山君，扶持晋城大君即位，史称“中宗反正”。中宗反正后，士林力量有所恢复，朝纲重振，一时颓废的士风也得以重新整肃。

因此，这一时期朝鲜的侍讲官也常拿文天祥事迹做教材。如中宗九年（正德九年，1514）侍讲官许碕讲《宋鉴》，讲到文天祥被押解至燕京时，称赞了文天祥忠义崇节，并建议朝廷应“当褒奖节义”，从而树立肃然正气。其中写道：

文天祥在元，则乃敌国之臣也，嘉尚节义，供张甚盛。大抵人君必崇奖节义，扶植纲常，然后大防立而人心定矣。前日教云：

① 《朝鲜成宗实录》卷273，成宗二十四年正月丁丑，第8页下。

② 《朝鲜宣祖实录》卷19，宣祖十八年七月朔庚午，第10页下。

③ 《朝鲜燕山君日记》卷首《总序》，第263页。

④ 《朝鲜燕山君日记》卷22，燕山君三年三月辛酉，第13页上—14页下。

⑤ 曹伟：《燕行录》，《燕行录全集》卷2，第171—173页。

“当褒奖节义。”又命治废朝承旨等失节之罪。自后朝廷，稍有肃然之气。^①

中宗十七年（正德九年，1522），侍讲官金铉临讲《续通鉴纲目》时指出君主当树立死节之臣的典范，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为典型，改变浮躁的士人风气，并写道：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当危难，操节义，守死不贰，此宋朝培养人才之力也。大抵，平居无犯颜极谏之人，则临乱，无伏节死义之臣也。顷者，培养失道，年少浮薄之辈，竞生躁进之心，假托经术，号称贤良者，反生反逆之谋，指安处谦等事也。士习至今不变，非细事也。^②

再如仁祖六年（崇祯元年，1628）士人李晤针对当时朝鲜的弊政，引用文天祥之言，告诫君主应体察民情、遏制贪腐，防止权贵与民争利，上疏道：

臣闻文天祥之言曰：“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今之民怨极矣。自夫号牌以来，至今侵刻，而民困矣；自夫贪官污吏，剥削是事，而民困矣；自夫贡案失正，重其赋敛，而民病焉；自夫内司投属，为弊日滋，而民病焉；权贵之渔夺犹昔，诸官之作弊倍前，则今之民怨，不亦多乎？灾不虚生，必有所召。救之道无他，唯在应之以实，实之以诚也。念念而诚之，事事而诚之，则足以救十数事之失。十数事之失既救，则人事既修矣，人事既修，则可以回天心矣。^③

中宗之后，朝鲜虽然暂时摆脱了燕山君这样的暴虐君主统治，但是朋党政治却在士林中逐渐兴起，先是“己卯士祸”“乙巳士祸”，接着宣祖、仁祖年间东西党人各派系间党同伐异，政争不断，文天祥的贤良与高风亮节在历史中反复诉说，成为士林儒生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人格。

三、“思明”“奉清”困境与文天祥记忆的重塑

文天祥形象的变化与朝鲜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同样也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率军亲征朝鲜（即丙子之役），朝鲜受制于后金政权，国家政权面临新的危机。1637年元月，仁祖被迫与皇太极签订“南汉盟约”，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接受清朝的册封，朝鲜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

朝鲜王朝的合法性来自明朝的册封，与明朝关系的切断，意味着权力与合法性的分离、历史与现实合法性的断裂，这几乎是任何统治者必须着手解决的法理困境。朝鲜虽屈服于清朝，但内心有着强烈的反感，而且看到异族入主中原，华夏道统断绝，朝鲜王朝滋生出强烈的尊王攘夷和思明意识。^④在此情况下，对文天祥的尊崇成为重构历史记忆、树立正朔形象的重要手段，如在“丙子之役”时“手裂和书”的朝鲜重臣金尚宪，被后金关押至沈阳三年，坚贞不屈，展现出儒家士大夫的忠义之气。金尚宪病逝后，朝鲜史官对他评价道：“文天祥收宋三百年正气，世之论者以为天祥之后，东方唯尚宪一人而已”^⑤，将他比作文天祥，这不仅是突出其崇高气节，“以为天祥之后，东方唯尚宪一人而已”一句，更体现了明亡后朝鲜以“小中华”正统自居的文化心态。

在此背景下，清代朝鲜使臣留下的相关诗作的内涵也与明代时有所差异。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老稼斋燕行录》中留《柴市文丞相庙》诗一首：

国破公犹在，公亡宋遂亡。
身名完一局，义烈贯三光。
崖海风云阔，临安禾黍长。
公灵欲何往，天下又戎王。^⑥

① 《朝鲜中宗实录》卷20，中宗九年二月丙申，第3页下。

② 《朝鲜中宗实录》卷43，中宗十七年正月丙辰，第53页下。

③ 《朝鲜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八月丁未，第14页下。

④ 关于朝鲜的尊周攘夷、思明问题，参见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⑤ 《朝鲜孝宗实录》卷8，孝宗三年六月乙丑，第82页下。

⑥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录》，《燕行录全集》卷33，第16页。

上诗除了表达对文天祥的崇敬与怀念以外，背后还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明亡后，朝鲜虽与清朝确立宗藩关系，但只是表面臣服，内心却十分鄙夷，且自认为“中华”正统，视清朝为“夷狄”，宗藩与华夷在清朝与朝鲜关系上恰好是相悖的。虽清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试图解决，但朝鲜与清朝貌合神离，这种视清朝为“夷狄”的意识从“公灵欲何往，天下又戎王”等诗句中明显地流露出来，这些诗已不再是单纯表达怀念与崇敬之情，而且上升到“华夷之辨”的高

度，也为清初时朝鲜“北伐”以“复仇雪耻”^①提供依据。

在“尊周思明”这一特定的文化心态影响下，朝鲜士人关于文天祥的历史记忆在特定的场所被重新激活。自与明清两朝互通使节以来，顺天府的文天祥祠（三忠祠）一直是朝鲜使臣入华的必经景点。从现有《朝天录》与《燕行录》来看，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开始，便有使臣拜谒文天祥祠，^②对此明清两代朝鲜使臣共有详略38次描述记录，统计见表1。

表1 明清时期朝鲜使臣对文天祥祠描述统计表

序号	时间（明清年号）	人物	出处
1	成化二十三年（1487）	崔溥	《锦南漂海录》
2	弘治十一年（1498）	曹伟	《燕行录》
3	万历二十五年（1592）	权挟	《石塘公燕行录》
4	万历三十年（1602）	李民宬	《册壬寅朝天录》
5	天启三年（1623）	李民宬	《癸亥朝天录》
6	天启四年（1624）	洪翼汉	《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
7	康熙三十四年（1695）	佚名	《燕行日记》
8	康熙五十一年（1712）	金昌业	《燕行日记》
9	康熙五十一年（1712）	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录》
10	康熙六十年（1721）	俞拓基	《燕行录》
11	乾隆二年（1773）	李喆辅	《丁巳燕行日记》
12	乾隆十六年（1751）	朴趾源	《热河日记》
13	乾隆二十年（1755）	佚名	《燕行日记》
14	乾隆三十年（1766）	洪大容	《湛轩燕记》
15	乾隆四十三年（1778）	蔡济恭	《含忍录》
16	乾隆四十七年（1782）	洪良浩	《燕云纪行》
17	乾隆五十一年（1786）	沈乐洙	《燕行日乘》
18	乾隆五十八年（1793）	李在学	《燕行日记》
19	乾隆五十八年（1793）	李在学	《癸丑燕行诗》

① 参见孙卫国：《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第199—216页。

② 在顺天府有三忠祠，明代将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三位忠义贤人设祠祭祀，这也包含在拜谒范围内。

(续表)

序号	时间(明清年号)	人物	出处
20	嘉庆二年(1797)	徐有闻	《戊午燕行录》
21	嘉庆六年(1801)	李基宪	《燕行诗轴》
22	嘉庆六年(1801)	李基宪	《燕行日记》
23	嘉庆六年(1801)	柳得恭	《辘车集》
24	嘉庆二十一年(1816)	李肇源	《黄梁吟》
25	嘉庆二十三年(1818)	成佑会	《茗山燕诗录地》
26	道光二年(1823)	徐有素	《燕行录》
27	道光八年(1828)	朴思浩	《燕蓟纪程》
28	道光十一年(1831)	佚名	《燕行日记》
29	道光十二年(1832)	金景善	《燕轶直指》
30	道光二十八年(1848)	李遇骏	《梦游燕行录》
31	道光三十年(1850)	权时亨	《石湍燕记》
32	咸丰元年(1851)	金景善	《出疆录》
33	同治元年(1862)	崔秉翰	《燕槎从游录》
34	同治元年(1862)	李恒亿	《燕行日记》
35	光绪八年(1882)	权复仁	《天游稿燕行诗》
36	光绪十三年(1887)	李乘五	《燕槎日记》
37	未详	佚名	《燕纪程(地)》
38	未详	佚名	《燕行录》

明清易代以后，清代朝鲜使臣对文天祥祠已不再单纯描写地理位置，而是更注重掌故、内部建置以及精神内涵，且篇幅较长。^①在《燕行录》中，朝鲜使臣记载了明代对文天祥的祭祀及追封活动，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燕行日记》中记道：

文丞相祠屋仅三间，庭庙甚隘。殿内书

万古冈常四字，塑像作秉笏仰视状，眉目疏朗，其衣袍冠类幞头，亦类兜鍪。……《大兴县志》曰：“元至元壬午十二月初九日，公死于柴市。是日，风沙晦晦宫中，皆秉烛行，世祖悔之，赠公金紫光禄大夫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庐郡。公谥忠武，使王积翁书神立阴柴市设坛，丞相孛罗祭之。族风卷起，神主云

① 明代共有五名使臣拜谒文天祥祠，从身份上看，有大臣如洪翼汉、曹伟等，亦有著名学者、文人如崔溥、李民成等；在清代，无论从拜谒次数和留下诗文的数量上来看，都远远超过了明代。清代有28位使臣拜谒过文天祥祠：从身份上看，有学者，如金昌业、李喆辅、洪大容、朴趾源等，也有官员如俞拓基、徐有素、蔡济恭等；从比例上看，学者、文人所占比例较明朝增多；从内容上看，明朝时对文天祥祠的描述多简略，万历二十五年(1592)权挟《石塘公燕行录》中指出：“展拜三忠(祠)乃诸葛武侯、岳武穆、文丞相也。皇上春秋降香行祭云”；天启三年(1623)李民成《癸亥朝天录》：“文天祥庙在顺天府学之西”等简略描述，而清代时描述较丰富且注重其内涵。《石塘公燕行录·癸亥朝天录》，见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卷2，第74页；卷14，第214页。

中雷隐隐,若怒声画愈晦以张天师言,乃改书神主曰: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天乃霖。明日欧阳夫人从东宫得令旨收葬,公江南十义士界出都城,禀葬小南门外五里,识其虞大德三十年,公继子陞来北京,于顺成门内见石桥织绌人妇,公之旧婢绿荷也,指公瘞虞见大小二僧塔,一塔有小石碑刻信公二字,至元二十年归庐。柴市即此虞也。洪武九年北平府事刘崧始请立祠堂,永乐六年太常博士刘履节奉旨祭以春秋云。遂行出大路市多柴车,观此益验其为柴市也。^①

通过明清两代使臣祠堂的描写差异,可见朝鲜士大夫阶层对文天祥的认知逐渐深入,并且主动关注其内涵。相反,清朝京城民众对文天祥祠却十分冷漠,这在使臣记述的场景中形成强烈的反差。康熙六十年(1721)俞拓基《燕行录》中载:“问文丞相庙所在,则胡人所答一无相似,或云文丞相庙距此不远,或云初无所闻,或云昔有而今无。”^②再如乾隆三十年(1766)洪大容《湛轩燕记》中记:“问三忠祠及柴市,皆不知。余曰:文丞相庙塑像破伤无余,无人修理,见甚可悲。”^③从这些愤慨的话语中可看出,朝鲜士大夫对文天祥强烈的推崇,与清代京师民众形成对比,可见在清初,朝鲜士人的文天祥记忆已经深入人心。

朝鲜英祖在位时期,朝鲜的“尊周思明”活动达到顶峰。英祖二十六年(乾隆十五年,1750),“谢恩正使赵显命,得天祥遗像于燕中,归献于上”,并说道:“文丞相精忠、义烈,令人起敬。”^④英祖“以宋信国公文天祥,配享于永柔卧龙祠”^⑤。对此,有大臣谈道:

卧龙祠,即宣庙御龙湾时兴感而命建者。岳武穆追配,亦昔年旷感之圣意也。今欲以信国公追配,亦继述之意也。噫!卧龙欲复汉室,武穆欲迎二帝,信国欲存宋祚,三贤忠则一也。^⑥

朝鲜方面以崇高祭祀之礼对待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三人,认为三人皆是忠义贤人。文天祥配享卧龙祠后,朝鲜英祖“亲制文,遣近侍致祭。其后命竖碑,使大提学南有容记其事”,^⑦并言道:“岳武穆以恢复为心,故先朝特配永柔卧龙祠,今以文丞相配之,亦宜矣。”^⑧此时朝鲜对文天祥的尊崇已上升到“华夷之辨”的高度。英祖借文天祥强调朝鲜对明朝的忠诚,使文天祥成为“尊周思明”的记忆载体,“思明”的政治符号。

清康熙以降,随着清廷不断重塑正统,对朝鲜实行德化政策,燕行使臣的待遇也不断改善。^⑨到18世纪末,朝鲜士人对“文天祥”其人其事呈现出一种“失忆”状态。随着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朴趾源等学者为首的“北学派”开始批判“尊周攘夷”思想,朝鲜的文化心态逐渐从“尊明”转为“奉清”。为此,19世纪后的《朝鲜王朝实录》中难见关于文天祥的记录,文天祥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由政治符号变为历史人物。不过在一些使臣的诗文中仍有记载,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蔡济恭《文丞相祠》诗:“文相祠堂草木荒”;^⑩乾隆五十八年(1793)李在学《文丞相庙》一诗:“寂寂燕城庙,堂堂宋信公。小楼惟赤日,荒市尚悲风。塑想三分影,碑留一片衷。临风无限感,独立夕阳多。”^⑪清末佚名《燕行日记》:“而今焉庙貌颓圯,尘埃满榻,反不如寺观(下转第189页)

① 金昌业:《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卷31,第350—351页。

② 俞拓基:《燕行录》,《燕行录全集》卷38,第231页。

③ 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全集》卷49,第28页。

④ 《朝鲜英祖实录》卷71,英祖二十六年二月丙子,第7页下。

⑤ 同上,第12页下。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第7页下。

⑨ 参见孙卫国:《朝鲜王朝对清观之演变及其根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51—62页;李元淳:《朝鲜赴京使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见《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83年,第346页。

⑩ 蔡济恭:《含忍录》,《燕行录全集》卷40,第381页。

⑪ 李在学:《癸丑燕行诗》,《燕行录全集》卷57,第502页。

误读逐渐成为郭实猎译介中国叙事文学的痼疾，遮蔽着郭氏的双眼，使其最终没能通过翻译欣赏到中国叙事文学的独特魅力。

尽管如此，郭实猎《香山宝卷》译介的特殊意义却不容忽视。他不仅最早把中国宝卷这一特殊叙事文学种类介绍给西方读者，而且还显现出将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法引入译介活动的端倪。正如美国汉学家姜士彬（David Johnson）所说：“现存有关中国古代公共场所宣卷活动的表演描述极为稀少。”^①相较于《金瓶梅词话》《海上冶游备览》等作品中连篇累牍的家庭“宣卷”记录，郭实猎对普陀山所见《香山宝卷》的描述无疑为后世保留了清道光年间浙东地区大型佛寺宝

卷宣讲活动的珍贵镜像。此外，郭实猎的《香山宝卷》译介也为学界考证“同治版”《香山宝卷》的始刊时间和流传区间提供了新的线索。更重要的是，郭实猎《香山宝卷》的译介是西方新教传教士认真研究中国佛教及民间宗教的前奏。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欧德里（E. J. Eitel, 1838—1908）^②、艾约瑟^③、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④等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以更加扎实的汉学功底和更为科学的方法展开对佛教和民间宗教的深入探讨，“他者审视”下的中国宝卷逐渐走出了“中华归主”研究动机的禁锢，英语世界中国宝卷研究和译介的新篇章也随之开启。

（姚伟：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施晔：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接第109页）之侈丽，甚可痛叹”^⑤等。不过这些词句中“华夷之辨”的词句已经消失，不再称清为“蛮夷”“胡虏”，对文天祥祠的感受基本也只是物是人非的怀古咏叹。

四、结 语

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形象记忆随时代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内涵。本文分析了文天祥由历史人物变为朝鲜王朝建立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符号，提振士风的理想人格、尊周思明的文化符号，以及淡出政坛，又成为历史人物的过程。朝鲜王朝建国之初尊崇文天祥，一方面是出于治国兴德政、尚忠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天祥的人格魅

力和政治素养是朝鲜士林儒生效仿的楷模，这在士祸不断的朝鲜王朝中期受到格外重视。明清易代之后，朝鲜权力与合法性来源发生分裂，强烈的华夷观念让朝鲜坚信明亡后中华正统在朝鲜，并试图“北伐”以“复仇雪耻”。在此背景下，文天祥的抗元事迹成为朝鲜王朝后期“思明”的历史依据，朝鲜使臣从不同角度对文天祥祠和事迹宣扬，与诸葛亮、岳飞同享祭祀。然而到18世纪末，由于北学兴起，清朝与朝鲜关系逐渐稳定，朝鲜君臣的文天祥记忆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逐渐消退，只余下使臣诗文中的一抹悲情。作为朝鲜君臣的集体记忆，文天祥抗元事迹既承载着理学伦理对朝鲜君臣道德的规范，也象征着朝鲜王朝对“华夷之辨”的执着。

（赵士第：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徐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① David Johnson, "Mu-lien in Pao-ch'uan: The Performance Context and the Religious Meaning of the Yu-ming Pao-ch'uan," *Ritual and Scripture in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Five Studies*. Ed. David Johnson. Berkeley: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Project, 1995, p. 68.

② 欧德里为英国外交官，著有《中国佛教学学习词典》（*H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Buddhism*）。

③ 艾约瑟著有《中国佛教》（*Chinese Buddhism*），其中第23章讨论了罗清“无为教”的“五部六册”和《罗祖出世退番兵宝卷》。

④ 高延为荷兰汉学家，著有《中国民间宗教迫害史》（*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其中讨论了“无为教”“先天道”的部分宝卷。

⑤ 佚名：《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卷86，第92页。

dissemination of the nationalist ideology in terms of the literary conceptions, history-writing methodologies and ideological intentions.

Key words: Monbushō Kentei Juken, Monbushō Kentei Juken Shina bungaku-shi, Kan bun kyōiku, sinological studies

The Academic Genealogy of Miyazaki Ichisada

Wang Guangsheng

Abstract: Following Naito Konan and Kuwahara Jituzoand, Miyazaki Ichisada is the leading Japanese sinologis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his academic formation and achievements. To accomplish this, one must focus on the stimuli and effects of the historical study groups from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More importantly, it is quite necessary for scholars to analyze and realize the fact that the Miyazaki Ichisada's historical studies were influenced by such factors a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national ideology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comparativ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history. As a consequence, scholars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oriental history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Miyazaki Ichisada's academic studies.

Key words: Miyazaki Ichisada, Japanese sinology, Kyoto School

V. Alekseyev'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Dualism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Chinese Literature

Ma Xiao

Abstract: The idea of dualism in Chinese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opinion in V. Alekseyev's poetic treatise. Alekseyev applies the universal human thought pattern of dualistic opposition and unity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xpou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dea of literary d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riness, worldview and poetics,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are dialectically united, while Chinese literature is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taking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poetic concept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s the starting point. Based on Alekseyev's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perceived by Alekseyev, as well as the interplay of different poetic concepts influenced by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and poetry.

Key words: V. Alekseyev, the duality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poetics

The Memory of Wen Tianxiang among Joseon Kings and Literati (1401—1887)

Zhao Shidi & Xu Tian

Abstract: As a hero of the late Song dynasty who fought against the Yuan dynasty, Wen Tianxiang was treated grandly by the Korean monarchs in the Joseon dynasty for more than 400 years. The Korean monarchs and ministers not only cited Wen Tianxiang's words and deeds, but also published his collected works in memory of him. Wen Tianxiang became a cultural memory of the Korean monarchs and ministers in this process of repeated and continuous pursuit of him, which reflected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of the Joseon dynast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Joseon dynasty, the change of royal power and generations of disaster made Wen Tianxiang a model of the ethics of Cheng and Zhu. However, after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of the Korean royal power won Wen Tianxiang the respect for his resisting the Yuan dynast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shaping a “little China”. With the eas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Korea and the rise of Northern Learning, Wen Tianxiang’s deeds were gradually forgotten by Korean scholars with the rise of Northern Learning. Th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Joseon dynasty in the more than 400 years of the Korean dynasty forged the memory of Wen Tianxiang, which can only be recognized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time.

Key word: Wen Tianxiang, the dispute between Hua and Yi, Joseon dynasty

Confucian Exchanges Between Vietnamese Envoys and Chinese Officials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as Seen in the *Complete Account of an Envoy to the North*

Nguyen Thi Tuyet

Abstract: From the 25th to 27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1760—1762), the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Lê Quý Đôn of Vietnam went to China as an envoy. His experience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was a model in the history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Complete Account of an Envoy to the North* 《北使通录》 by Lê Quý Đôn,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envoys’ visit to Confucian Temple and Guozijian in Beijing, and their discussion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during their stay in China regarding the discussion between Han Confucianism and Song Confucianism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mind-learning. The envoys and Chinese officials also commented on each other’s classics and historical works. Lê Quý Đôn mirrored Vietnamese academic researches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showed the tendency of preferring practical study and textual research.

Key words: *Complete Account of an Envoy to the North*, Vietnam’s envoys, Confucian exchanges, Lê Quý Đôn, Confucian Temple and Guozijian

A Study on the Earliest Baptized Members of the Ming Imperial Family

Hu Jianwen

Abstract: In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spread of Catholicism in China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earliest members of the Ming imperial family who were baptized in Nanchang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were little-known and did not attract much attention, so they were rarely involved in relevant studies in China and at abroad. Based on the original records in Matteo Ricci’s memoirs and the genealogical information of the Ming royal family in Nanchang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China and the West describing the royal family of Nanchang, to narrow down the identity of this group of baptized persons, thus enriching the academic cognition of Chinese Catholic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late Ming dynasty, baptized royal family members, Catholicism, Nanchang